

历史纪实丛书

张宗平 汤重南 著 辽宁古籍出版社

2000万 中国人之死



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中国伤亡
3500万人，其中死难者2000余万人



96
K265.6
22
Z

历史纪实丛书

2000 万中国人之死

张宗平 汤重南 著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 沈阳

335524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辽)新登字 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0 万中国人之死/张宗平等著. —沈阳: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5. 8

ISBN 7-80507-310-4

I. 20...

II. 张...

III. 日本—侵华事件—1931~1945

IV. K265.6

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辽宁档案书刊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1—5000

责任编辑: 高虹 版式设计: 徐悦

封面设计: 李国盛 责任校对: 笑梅

定价: 13.60 元

纪念——
牢记——
悼念——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中华民族历史特大悲剧
2000 万死难的中国人

目 录

第一章

恩将仇报 狼子野心

——日本侵华思想的由来 (1)

第二章

蚕食东北 鲸吞中国

——疯狂发动和进行侵华战争 (27)

第三章

丧心病狂 凶残屠杀

——70万同胞血染扬子江 (52)

第四章

敲骨吸髓 迫害压榨

——水深火热中的沦陷区人民 (102)

第五章

丧尽天良 惨绝人寰

——食人的日本细菌战和毒气战 (135)

第六章

灭顶之灾 狂轰滥炸

——对和平城市的无区别大轰炸…………… (172)

第七章

灭绝人性 实行“三光”

——“扫荡”抗日根据地，杀光、抢光、
烧光…………… (200)

第八章

暴虐坑杀 白骨成堆

——80个“万人坑”的无声控诉…………… (221)

第九章

魂丧日本 恶魔淫暴

——在日劳工、“慰安妇”的血与泪…………… (242)

第十章

艰苦卓绝 终获全胜

——中华民族的抗争与胜利…………… (268)

附录一

关于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数字

(3 500 万及死亡 2 000 万人) 的考察综述 … (298)

附录二

国民党抗日殉国将士一览表…………… (303)

附录三

日本法西斯恶魔的下场…………… (314)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情况，日本甲级
战犯中 11 个战争罪犯及在侵华战争中策划主
谋者 7 个日本战犯罪恶一生介绍。)

附录四

 中国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处情况..... (413)

附录五

 侵华日军伤亡统计表..... (416)

后 记..... (417)

第一章

恩将仇报 狼子野心

——日本侵华思想的由来

以东条英机之流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疯狂发动和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在1931年至1945年间，日军铁蹄践踏了中华大地，所到之处，凶残暴虐，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2000万，流离失所在1亿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0多亿美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从而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最可耻的一页。

回顾2000多年的中日关系史，日本如此残暴地虐杀中国人民，践踏中国大地，确实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早在2000多年前，中日两国这一衣带水的近邻已开始了友好交往。在近2000年间，日本从中国学习和引进了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日本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逐渐发展到先进，是受惠于中国的。

若从更久远的洪积世、旧石器时代考察，亦可发见中日两国之间已有通交关系，大量的出土遗物和遗迹等考古学、地

质学成果可充分证明这一论断，这已成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共识。就是日本民族的族源问题，亦有中国大陆“江南说”和“东北说”，而“日本人种中杂有中国人种的血统”，则是中日两国民族学学者的共识。

在远古时代，中日之间是有陆路相连的。只是在1万年前因海水上涨，才将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分开，茫茫大海才将中日两国阻隔成一衣带水的邻邦。虽然在地理上有一水相隔，而在文化上，由于位置相近，先人们不畏艰险，仍冲破险阻，进行友好交往，自古以来就结下了相互影响、彼此浸润的源远流长的不解之缘。

在中国已发展到封建社会历史阶段，日本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后期和部落联盟历史阶段，尚未形成国家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中日间最初的交往，是以日本多方面受到中国经济、文化影响而开展的，终于使日本发展成“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的重要一环。

这种影响，从上层统治者逐渐扩展到下层平民百姓，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逐渐深入到精神生活、文化艺术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在周秦时代甚至更早以前，中日两国人民已有往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日益频繁，逐渐由民间的经贸往来发展到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交往。中国正史中关于日本的首次记载是《汉书·地理志》的一段话：“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古代日本的国名为倭，倭人即指日本人。中国的汉式铜镜及两汉之间的王莽新朝的货币，均在日本有大量出土和发现。东汉时日本对中国更进一步发展为“遣使奉献”或“奉贡朝贺”了。《后汉书》的《东夷列传》中

已将倭列为专传，并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后汉书》成书早约 150 年的《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对日本列岛情况作了更为详尽的记载。《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当时日本列岛在政治组织等方面均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隋朝仅 38 年，日本就曾 5 次派遣使节，其中 3 次还随带着留学生和学问僧，充分表达出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迫切愿望。当时推古天皇的摄政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即官制官位 12 等级）、“宪法十七条”和使用历法等，均显然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刺激和影响下所进行的推古朝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皇室地位，加强了中央集权，适应了日本社会需要，加快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到唐代时期，中国已发展为文化繁荣、法制完备的封建大帝国，而当时日本正处于社会制度新发展、大变动时期。为引进唐朝的先进文物制度，从 630 年至 894 年的 264 年间，日本共任命遣唐使 18 次，到达中国的有 15 次。一般每次 200 多人至 500 多人，最多的一次达 651 人。遣唐使团在中国全面学习中国的经学、佛学、医学、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建筑、手工业技术及政治、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亦将大量的唐代书籍带回日本。先进的唐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日本不仅移植了唐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而且将唐的法律、哲学思想、宗教、教育、文学、乐舞、书法、工艺美术、史学、医药、历法、建筑、体育娱乐、衣食风俗等均广泛引进和吸收，这对日本律令制度的完善、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较为顺利地通过大化革新而进行日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均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日本“中古之

制度”多“模仿唐制”，形成“全面唐化局面”，因而在长达300年的日本“唐风文化”时期，日本社会历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日本历史本来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的。

从唐末到清末，中国文化虽不似隋唐时期那样频繁、大量地传入日本，但亦是不断地、持续地传到日本，从而使中国的较为先进的文化施其影响于日本。900多年间，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依然是十分广泛而深刻的，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得较为明显的领域。佛教方面是中国传入日本的禅宗及用中国传入的佛经创立的日本净土宗。禅宗的传入对日本文化特别是建筑、绘画、有关茶道及陶瓷器等诸多领域，均有很深刻的影响。在儒学方面，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在日本广泛传播，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一大势力，并在日本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在日本江户幕府时期（1603—1867年），宣布朱子学为官学，以其大义名份、伦理纲常等维护德川幕府的“幕藩体制”。明末遗臣朱舜水到日本，为水户藩主（诸侯）德川光圀（国）之宾师，水户学派的实学主义、尊王思想、正名论等思想，受朱舜水影响颇大，不仅影响及于当时，对明治维新前后尊王倒幕思想亦有相当影响。宋学分化出的古学派和阳明学派，对明治维新思想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总之，在整个古代时期，总的情况是日本受惠于中国，在近两千年的交往中，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如果没有这种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日本后来的历史发展将会是另一种状况。当然，即使在古代时期，也有部分领域，或某些局部存在中国向日本特长学习的情形。总的看友好交往是主流。也有过三次规模大、影响深的中日之间的战争。第一次是663年

日本发动的干预朝鲜半岛诸国间的政治、军事纠葛，唐朝高宗亦企图控制朝鲜半岛而在朝鲜白江口（今锦江口）进行的中日间第一次战争——白江口战争。结果是唐朝与朝鲜新罗联军打败日军，挫败了日本中大兄皇子为首的领导集团控制朝鲜的野心。第二次中日之间的战争称“元军征日”。蒙古奴隶主在灭宋过程中及灭宋后，两次发兵侵略日本，元朝忽必烈为胁迫日本臣服元朝，实现其扩张的野心及垂涎日本的黄金（当时盛传日本是黄金国），于1274年（日本文永11年）和1281年（日本弘安4年）两次东征日本，遭到日本人民英勇反抗，最终惨败。日本史称文永、弘安之役。第三次是1592年和1597年，通过战国群雄混战而实现日本统一后不久，实际统治日本的丰臣秀吉为实现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两次发动侵朝战争，明朝政府应朝鲜要求出兵朝鲜援朝卫国，组成中朝联军，奋击日军，粉碎了丰臣秀吉占朝鲜进而取中国的战略企图。这三次战争留下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侵略者最终必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日两国间，应以“讲和为主，罢战为强”；睦邻友好，平等相处，互通有无，才是共同繁荣的最佳之策。

但从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地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300多年间不绝如缕且日益猖獗。

丰臣秀吉1585年出任“关白”（摄政），总摄日本国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日本政权后，为解决统一后的日本社会矛盾和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及霸权思想作祟，提出和采取了对外扩张的计划和政策。据史书所载，丰臣秀吉在1578

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伐播磨国（今兵库县）时，就对织田信长说：臣“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织田听后笑曰：“汝可谓大胆！”1585年，丰臣在大阪接见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柯艾留时，曾首次明确提出“征讨中华”，他说：“如今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之后，将让日本于兄弟（羽柴秀长），自己为征讨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为此，采伐木材，造船舰二千，率军出征。”1590年5月，丰臣致书朝鲜国王李昞：“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中国明朝），使其四百洲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当他得知1592年第一次侵朝战争初期顺利进军消息时，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他于5月18日从名古屋写信给在京都的关白丰臣秀次（秀吉的外甥，后收为养子）说：朝鲜京城已陷落，自己“急湏渡海，此行将直捣大明国”，并让秀次准备日本迁都北京，而北京“城周围十国（县），可贡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归你（秀次）领有”，日本国本土交由他人统治。6月，丰臣又写信给大阪城内的妻妾，明确地声称：他自己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遵圣意，占领天竺”。廖廖数语，野心毕露，亦暴露了他利令智昏的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正当丰臣做黄粱美梦时，传来了日军在中朝联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被迫议和撤军。1596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于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丰臣亦忧忿成疾，悲凄地呜呼离世。临终前，忽张目囑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毕而死。

丰臣死后，德川家康通过1600年的关原之战，确立了统

治全国的地位，并于1603年建立江户幕府，成为合法的全国统治者。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1610年，以幕府执政本多正纯的名目，实由大学头林罗山起草了致中国福建总督的信函。该函称：日本国主源家康已统一全国，“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环球称臣，他如安南、交趾、占城（均为今越南），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西洋（指新加坡以西）、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莫不献表纳贡”。此信所言并非均是事实，亦不知是否交到了中国。但它却具体而清楚地表达了德川家康追求的政策目标。日本外交史家信夫清三郎曾有过著名的论断，“在日本人中”“像林罗山那样认为朝鲜是向日本‘入贡’的国家”这一观念“相当强烈”，“想把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情绪，一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

作为德川家康所建江户幕府的“在野反对派”，著名的剑道家宫本武藏（1584—1646），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则下毒手，致人死命。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宫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建立起日本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1622—1685）。他将毕生的精力倾注在建立武士道的理论上。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著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他

聚众讲学，亦是著名的兵学家，有弟子4 000余人。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从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后，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直至明治维新，对日本统治长达600多年。其“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儒家思想融合，逐渐形成武士道。“武士道”，是封建武士应该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武士道在江户时代以前，还只是一种“实践道德”。到山鹿素行时，才从朱子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

将日本尊皇思想充分阐发的是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

长（1730—1801）。他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创造的神国，提出了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崇天皇的思想。他还宣扬“八纮为宇”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即将世界各国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梦想征服世界。还声称“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惟我天皇统治之日本国”，对天皇只有绝对服从。他倡导的“神道”精神，尊皇和日本优越等观念，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变为“国粹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工具。

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力倡开国论、海防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经世学派、维新运动先驱者们，都为日本近代推行的对外扩张的世界战略，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素材。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吉田松阴、岛津齐彬等。

林子平在《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著，书中三国指朝鲜、琉球和北海道）中，全面介绍朝鲜8道、琉球3省36岛和虾夷地（北海道）的历史沿革、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地理物产等情况，供日本人了解周边国家和地区。1786年林子平又著《海国兵谈》，纵论五大洲形势，提醒国人勿忘“江户（今东京）日本桥下水，直通中国与荷兰”，勿忘日本是四周为海洋环绕，与世界联在一起的“海国”，启迪世人站在日本桥上，放眼世界风云。一部《海国兵谈》，实为海国日本武备的百科全书，论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备，又具体提出了各项防卫措施、依次论述了水战、陆战、军纪、战略、夜战、选士、编制、行军、兵器、辎重、攻城、守城、操练等。在经世学派中，最早论述海防论者正是林子平。而海防论除了研讨海国危机，为寻求经国济世之策，忧思焦虑，构思应对西力东渐之策略等正面、积极的作用外，海防论亦为近代日本